



邹韬奋：“真诚地为人民服务”的出版家



邹韬奋。

邹韬奋，江西余江人，1895年出生于福建永安，是中国杰出的出版家、卓越的爱国志士和民主先锋。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在上海病逝。1944年11月22日，延安各界隆重集会追悼邹韬奋，毛泽东为其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为满足人民精神需求而竭诚服务

1926年10月，邹韬奋接任《生活》周刊主编。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新闻出版事业，自愿“老死此乡”。《生活》周刊原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指导职业教育的机关刊物。邹韬奋接手《生活》周刊后，从内容和形式上对《生活》周刊进行了改革。一是明确服务人民、满足人民精神需求的办刊宗旨。邹韬奋提出“以生动

的文字、有价值有兴味的材料”，谋求“人人得到丰富而愉快的生活”，进而“养成健全的社会”。他要求一个编辑“要用敏锐的眼光、深切的注意和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食粮’”。二是密切与读者的联系，增强服务意识。邹韬奋提出，真实地报道人民群众的生活，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尤其替受苦的民众发出“对于社会的呼吁”。他在周刊开设“读者信箱”专栏，认真解答读者来信，“把读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三是创办“书报代办部”，除代购书报外，还义务代办读者委托的各种事情。因此，《生活》周刊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销量逐年攀升。1932年7月，邹韬奋在上海创办生活书店。与《生活》周刊一样，生活书店致力于发展满足人民精神需要的文化出版事业，成为在国内外有巨大影响的革命文化堡垒。

由于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生活》周刊在1933年12月8日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查封。随后，邹韬奋又先后创办、主编了《大众生活》《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抗战》（后改名为《抵抗》）《全面抗战》《大众生活》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纪念邹韬奋对新闻出版文化事业的伟大贡献和继承发扬邹韬奋的精神，有关部门设立了全国性的韬奋出版奖和韬奋新闻奖。

为抗日救国而奔走呐喊

1928年5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济南，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邹韬奋在《生活》周刊发表《一致》《对付国仇靠什么》等评论。他激于民族危亡之义愤，不再回避政治问题，指出知识界负有唤起民众的责任。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在《无可掩饰的极端无耻》一文中旗帜鲜明地谴责“不抵抗主义”是“极端无耻主义”。在《谁都没有责备请愿学生的资格》一文中，邹韬奋维护

并引领学生救亡运动，高度赞扬“这是大众运动的急先锋，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

邹韬奋质朴、刚烈、疾恶如仇、敢想敢干的性格决定着他成为英勇无畏、无惧强权的文化战士，勇敢战斗在民族解放的第一线。邹韬奋强调人民群众在抗日救亡斗争中的中心地位和关键作用，提出救亡斗争的中心力量“唯在依靠勤苦大众”。1935年8月，邹韬奋响应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八一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团结抗日，民主自由”的口号。1936年5月，邹韬奋、沈钧儒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力促进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同年11月，邹韬奋与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史良、章乃器、王造时等因主张抗日救国而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243天的牢狱生活，使他成为“救国运动之民众爱戴的领袖”。

七七事变后，邹韬奋始终冲锋在时代的最前线，热情歌颂中国军民英勇抗日的爱国主义精神，极力反对妥协投降，积极推进国内政治民主和争取国际援助。他领导的生活书店，除陆续出版8种杂志和近千种书籍外，还为民众出版了《战时读本》和《大众读物》。邹韬奋把生活书店员工比喻为“准备为文化事业冲锋陷阵的一个小小军队”“以至诚热血，追随社会大众向着光明的前途迈进”，把自己比喻为“一个喇叭手，吹出人民大众的要求”。邹韬奋以笔代剑，为抗日救亡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保障人民权益而执着追求真理

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的形势下，邹韬奋逐步走上了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提出“凡遇有所评述或建议，必以劳苦民众的福利为前提，也就是以劳苦民众的立场为出发点”。《生活》周刊从而成为宣传社会

主义的活跃阵地。邹韬奋开始接触和研究苏联问题，撰文介绍了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就。在研究苏联问题的过程中，他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指出“中国无出路则已，如有出路，必走上社会主义的这条路”。

1932年12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宣告成立。1933年1月，邹韬奋被推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年6月18日，实际主持其事的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邹韬奋也被列入黑名单，不得不流亡海外。流亡海外期间，邹韬奋充分利用一切机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34年7月14日，邹韬奋前往苏联进入莫斯科暑期大学学习，撰写了20余万字的《萍踪寄语三集》。他在《萍踪寄语三集弁言》中指出，世界大势有三条路，最后胜利的必定是苏联所走的“根本改造束缚这生产力的社会组织，代以为大众福利尽量利用进步生产力的社会组织”。中国的出路在“努力于民族解放的斗争”“促使世界人剥削人的制度的崩溃”。这是邹韬奋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世界问题和中国出路的代表之作，标志着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最终形成。归国后，邹韬奋在伟大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中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无愧于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荣称号。

邹韬奋数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出于党的工作需要，周恩来建议他留在国外发挥更大的作用。临终前，邹韬奋在口授的遗嘱中提出“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194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在给邹韬奋家属的唁电中接受邹韬奋的临终请求，追认邹韬奋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邹韬奋短暂的一生是追求光明的一生，为人民大众鞠躬尽瘁的一生。2009年9月，邹韬奋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据《团结报》）

窑洞里的“通信工厂”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陈列着一台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收报机，它曾是中央军委总部在延安指挥千军万马的通信工具。这台收报机是由我军在陕北窑洞里成立的延安通信材料厂自主生产制造的，它也成为那段峥嵘岁月里，边区军民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制造无线电设备，打破敌人通信技术封锁的历史见证。

中共中央对于在红军作战和白区工作中使用无线电联络的重要性早有较为深刻的认识。1928年起，中共中央通过多种途径培养红军作战和白区工作所需的无线电技术人员。红军开始大规模反“围剿”作战后，对建立无线电通信联络的需要更为迫切。1930年12月底，红军在龙冈战斗中缴获了只能收报不能发报的“半部电台”。随后，红军利用在东韶战斗中缴获的一部完整电台，加上这“半部电台”，建立了无线电台，直属红一方面军总部。在红军总部领导的支持和关心下，无线电通信队伍逐步壮大。至长征前夕，红军总部共举办无线电训练班11

期，先后培训报务、机务、电话、司号、旗语等各类通信人员2100余人，培养了一批无线电技术骨干，为抗战时期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抗战爆发后，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八路军总部决定化整为零，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然而，由于当时敌后根据地物资匮乏，且敌人在各地实行“囚笼”政策，各根据地被严密封锁、分割成片，使得通信器材的获取变得极为困难，如何有效指挥调度各地部队成为一大难题。因此，当时负责保障全军通信联络的军委三局，决心成立延安通信材料厂，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无线通信装备，以保障通信联络的畅通。

1938年春，延安通信材料厂在距离延安10余公里的盐店子村正式成立。工厂由10余个窑洞和四五间小平房组成。建厂初期，通信材料厂的主要设备仅有小型车床、刨床、钻床、砂轮机1台，全厂技术人员和生产工人只有20余人。

在条件艰苦、资源匮乏的情况下，通信材料厂员工在党中央领导下，发扬“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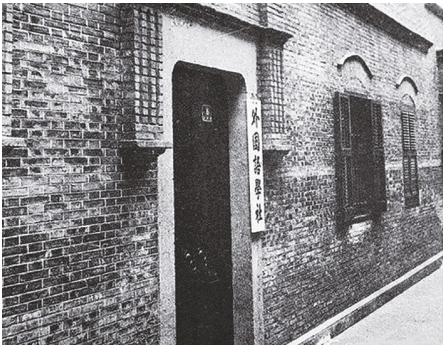
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攻坚克难，靠着热血和智慧进行技术创新。原材料不足便从破飞机、旧汽车、旧铁轨等物品中就地收集，缺乏教学设备和资料就依靠实践摸索，没有标准生产图纸就自己设计机器底板图、面版图……通过反复试验和改进，延安通信材料厂相继制造出可变电容器、可变电阻、电键等元器件。根据敌后游击战争的需要，通信材料厂先后装配数百部由电池和手摇发电机供电的小型电台、电话单机和总机。至1938年底，通信材料厂的元器件自给率达到40%，两年后达到70%。

通信材料厂不满足已取得的成绩，不断制造出新设备。随着战争形势发生变化，材料厂制造了一批能够进行更远距离通信的50瓦、100瓦大功率发报机；为让党的声音传遍大江南北，材料厂专门为新华通讯社制造了500瓦发报机；为更好支援敌后战场游击作战，材料厂还试制了小型报话机，仿制了日式小型手摇发电机……这些性能更优、功能更全的无线电设备，确保了党中央、中央军

委的指挥调度与信息交流畅通无阻，同时也大量供应前线作战部队，满足各抗日根据地通信联络的需要，成为对敌斗争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抗战时期，一台台无线电通信设备就这样从窑洞里的“通信工厂”中生产出来，装备到各部队中充当战场联络的“神经元”，织密了一张以延安为中心，辐射全国各部队、各根据地、游击区、敌占区的无线电指挥通信网络，使党中央的指示和中央军委的作战指挥命令化作一道道红色电波到达前线，指挥着千军万马，在多次重大战役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1947年，国民党军声势浩大地对延安发起进攻，党中央决定战略性撤出延安。延安通信材料厂被迫解散，相关生产设备和技术骨干分散到其余各解放区，组建新的通信器材厂，继续为通信事业贡献力量。尽管延安通信材料厂已不复存在，但从那段艰苦岁月中走出的“通信工厂”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通信事业的重要起点，激励着一代代通信人奋勇争先、不断前行。（据《中国国防报》）



外国语学校旧址。

1920年8月，陈独秀任书记，杨明斋、李汉俊、李达、沈雁冰、邵力子等人为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以下简称“发起组”）在上海成立。当时，黄浦江两岸人才汇集，各种学术观点纷呈，文化思潮活跃，全国各地追求进步青年纷纷前来，渴望吸纳新知识、接触新思想。李达晚年时回忆说：“五四运动后，湖南、湖北、安徽、

四川等地有不少青年对旧社会不满，要求思想解放。这些青年都有一股朝气，想干革命工作，想谋出路，许多人脱离了家庭和学校，来到上海。”

为培养、团结各地来沪的进步青年，他们提供学习、发展的场所，“发起组”决定利用上海外国租界密布、多种语言汇聚的条件，创办一家外国语学校，以公开授课为掩护，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秘密开展革命活动。

1920年9月28日，邵力子主持的上海《民国日报》登载《外国语学校》（以下简称“学社”）招生广告：“本学社拟分设英、法、俄、日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课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报名费1元；学费每月2元。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当时，“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还驻有杨明斋创办的“中俄通信社”，主要任务是用电报向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传

递中国革命消息，也接收“共产国际”电传十月革命后苏联各方面的真实情况；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创办的《劳动界》周刊，上海《民国日报》等报刊登载。“学社”招生广告虽称对学生收费，但由“发起组”成员和进步团体推荐的学员都一律免费，如：毛泽东以“新民学会”名义推荐的湖南学员任弼时、萧劲光等，陈独秀介绍的安徽学员吴葆尊、蒋光慈等，陈望道介绍的汪寿华、华林等。

1920年11月20日，“学社”正式开班，杨明斋任校长，李达、李汉俊、沈雁冰等分别教授法、英、日语，杨明斋和“共产国际”小组成员库兹涅佐娃讲授俄语。“学社”除提供外语教材，还把《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共产党宣言》作为必修课本。萧劲光晚年回忆说：“我读的第一本马克思的书就是外国语学校发的《共产党宣言》，当时读起来很费解，尽管字都认得，但好些术语不明白。书是陈望道翻译的，马列主义课也由他主讲，每个星期日讲一课。”学员们除了半天上课、半天自

修或做工，还要帮助“中俄通信社”抄写、油印、校对文稿，为《劳动界》周刊撰写稿件，柯庆施、陈为人、卜士奇等20多位学员先后发表了《失业问题与社会主义》《黄包车夫拉车吐血》等呼吁改变不平等的社会现状、关注劳苦大众的文章30多篇。他们同时也组织、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党的“一大”代表包惠僧在《党的“一大”前后》一文回忆说：“当时党的一些公开或半公开的集会，如：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纪念会，纪念‘五一’劳动节、马克思诞辰、‘三八’妇女节等集会都是在‘外国语学校’举行的。”

1921年2月，陈独秀得知苏联将创办“莫斯科东方大学”，他立即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希望接收中国学员入学，同时委托杨明斋在“学社”选拔学员，准备赴莫斯科学习。从1921年4月到7月，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等30多名学员，在“共产国际”的协调下，先后分3批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据《民主协商报》）

中央苏区的第一架飞机和第一个机场

1932年4月初，中央红军东路军进攻驻守福建龙岩、漳州地区的国民党军，发起漳州战役。4月10日，红军东路军全歼考塘守敌。当天下午，红军一举占领龙岩城。

4月14日，负责攻打漳州的红军东路军各部按时集结于龙岩，向漳州进发。19日拂晓，攻打漳州的战斗打响。红四军的主攻部队在机枪掩护下，向敌人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截至下午3时，红军攻克漳州，歼敌4个团。

此次战役缴获了两架飞机，让红军指战员非常兴奋，纷纷赶来观看。看到飞机外观基本完好，红军指挥员决定将其修复为己所用。红军请来了曾在苏联上过航校的红军指挥员冯达飞当飞行员，又找到当时在漳州的漳龙汽车公司工人张国材、陈文川参加飞机的修复工作。经检修，其中一架飞机恢复了飞行功能。

飞机很快就开始执行任务。1932年5月1日，红军在漳州中山公园召开了1万多人参加的“军民庆祝红军胜利攻克漳州大会”。庆祝大会进行中，一架涂有“斧头、镰刀”红色徽号的飞机飞临上空，在会场上方低空盘旋。这是冯达飞根据命令，驾机试飞。在飞抵公园上空时，传来一片欢呼。飞机在公园上空散发大批《告闽南群众书》的传单，借此鼓舞广大革命群众的斗志。

不久，这架飞机被命名为“马克思”号。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当时提出：“要把飞机开到瑞金去，建立起我们自己的飞行队伍。”消息传到瑞金，苏区苏维埃政府动员3000多名军民，在瑞金叶坪的沙子里岗奋战了6天，修建了平整开阔的机场，等待着飞机的降临。

当时聂荣臻正好要回瑞金汇报战况，就乘坐冯达飞驾驶的“马克思”号返程。聂荣臻乘坐“马克思”号返回瑞金时就是在瑞金沙子里岗机场降落的。这架飞机后来还在长汀公园展出过。

由于缺少燃油及更换的零部件，这架“马克思”号飞机在执行了一段时间任务后不得不“长期休息”，供苏区群众参观。后来，因战事频繁，为了避免该机再次落入国民党军手中，红军不得不将其销毁。（据《人民政协报》）

黄胄改名

黄胄以其独特的绘画风格和卓越的艺术成就而闻名遐迩。然而，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黄胄并不姓“黄”。

黄胄本姓梁，1925年出生在河北省蠡县的梁家庄。这个小村庄偏远而宁静，却也孕育了黄胄最初的艺术灵感。他的祖父身为乡里戏班头，在这样的家庭氛围熏陶下，黄胄自幼便对绘画展现出浓厚的兴趣与天赋。儿时的他，常常凭借自己的观察与想象描绘“戏子人”，在无人教授的情况下，在绘画的世界里独自探索，为他日后的艺术之路奠定了基础。

命运的轨迹在黄胄年少时发生了重大转变。仅仅上了一年初中，他便因父亲的离世而被迫中断学业。对绘画艺术的热爱与执着追求，驱使他毅然决然地离开家乡前往西安，开启了漂泊不定的生活。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黄胄在异地艰难求生，却始终未曾放弃对绘画的研习。

1939年，黄胄迎来了人生一个转折点。当时，潼关与西安遭受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黄胄随母亲和姐姐逃难至宝鸡，并进入宝鸡纺纱厂办的惠工中学就读。在一次学校组织的体育比赛中，他脱颖而出，荣获一面写有“炎黄之胄”的锦旗。彼时，年少的黄胄或许对这几个字的含义仅有朦胧的认知，但在语文老师详细地讲解之后，他深受触动。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国家正遭受外敌侵略，民族危在旦夕，“炎黄之胄”这4个字深深激发了黄胄内心的民族自豪感与责任感。于是，他毅然决定以“黄胄”作为自己的笔名，开启了自己的艺术征程。

此后，无论是早期在西北的艺术探索，与当地风土人情的深入交融，为其作品注入了浓郁的地域特色；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积极投身于时代主题的创作，用画笔记录下社会的变迁与人民的奋斗；甚至在“文革”那样艰难的岁月里，尽管作品题名曾有过“梁蓬”“梁泉”“梁黄胄”等变化，但“黄胄”这个名字早已成为他艺术身份的核心价值观，与他的绘画成就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据《人民政协报》）

“阑珊”原来是形容残尽之意

“阑珊”是一个古代诗词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词，古意盎然，一听就极雅致，因此今天的人们也特别爱用，但也常常误用，比如有人用“灯火阑珊”来描述城市中深夜繁盛的灯光，这样的用法是错误的，完全不懂“阑珊”一词的本义及其由来。

“阑”这个字造得很有意思。繁体字“闌”，在商周金文字形中，上面的“柬”像扎束起来的口袋，里面的黑点表示财物或东西；中间是一扇“門(门)”；下面还有一个“夕”，表示月亮升起了一半。整个字形会意为：天色已晚，家里关上门，清点财物，不准外人进入。

《说文解字》：“闌，门遮也。”“阑”由此引申为门前阻止外人进入的栅栏，这个义项后来写作“欄(栏)”或“檻(槛)”，即栏杆之意；再引申为阻拦，这个义项后来写作“攔(拦)”。这叫“古今字”，最早的古字“阑”因为义项被今字“栏”“槛”“拦”所分化和继承，反而成为今天很少使用的汉字了。

有个极冷僻的词条叫“阑入”，字面意思就是未经主人允许，擅自扒拉开栅栏，闯入主人家中。《汉书·成帝纪》记载了一个九岁小女孩引发的恐怖事件：渭河边有一处地方，地名非常古怪，叫“虬上”；这个地名古怪的地方有一个姓名非常古怪的九岁小女孩，叫“陈持弓”。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七月，陈持弓听说发洪水了，从长安城西侧的横城门入城，胡乱奔走，竟然从尚方署的边门闯进皇宫，一直到未央宫附近管理皇家园林的钩盾署才被发现。此事惊动了长安吏民，纷纷上城墙躲避洪水。

《汉书·成帝纪》称陈持弓“阑入尚方掖门”“无符籍妄入宫曰阑”，陈持弓没有任何入宫凭证，擅自从尚方署的边门闯入皇宫，这就叫“阑入”。

栏杆把一块地方围起来，栏杆的边界即为尽头，因此“阑”引申为将尽之意，比如酒宴即将结束称“酒阑”，“夜阑人静”形容夜将尽时分的寂静。“阑”又进一步引申为衰落、零乱、困窘之意。

“阑珊”是一个叠韵联绵词，其实就是将单字扩展为韵母相同而声母不同的双字，写诗时使声调和谐。与“阑珊”同样的叠韵联绵词还有“阑珊”“阑散”“阑残”。

（据《天津日报》）